

上海私立麦伦中学,即我中学母校继光中学的前身,其档案汇编即将整理出版了。主其事者嘱我为此写几句话,作为校友,当然义不容辞。

1962年夏,我从上海公平路第一小学毕业。同年秋,入继光中学就读。继光中学别致的校园,宽大的操场,小巧的图书馆,尤其是庄重的教学主楼体兰馆,还有和蔼的老师和活泼的同学,当时在我眼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可爱。从初一到高一,我在继光中学求学四年,后又待了两年。1969年春,我以“68届高中生”的身份在继光毕业,上山下乡去江西了。

入初中不久,我就知道了这所历史并不短暂的中学原名麦伦中学,1953年更名继光中学。当时只知道更名继光中学是为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英雄黄继光,

正午时分,我来到商洛市洛南县的“洛南古柏”所在地。

远观古柏,便被其高耸挺拔的葱郁姿态吸引。古柏长势良好,细观其躯干遒劲有力,显出勃勃生机。骄阳灼烧大地,立于古柏树下,瞬间清凉之意袭来。

见有人在古树前徘徊,一位村民忙前来问询。相互交流得知,他正是这棵古树的专职巡护员,名叫孟建明。“每年从过年到正月底,来这儿看古树、祈福的特别多。据说有求必应咧。”老孟边说边带我们绕树行走,寻一合适观赏角度:“你们看,那地方像不像个龙头?”顺其手指方向,可见树干分叉处有一分枝状如龙头,泛白的树皮似龙鳞,其上树干起伏若游龙,便也不难理解百姓对此树的敬畏之情。

望着眼前古树,守树人说:“形态巨大的树,甚至有人能住在其中。树有皮便能吸收雨水阳光,得以存活,而树体仅是支撑。树心空了是年长月久被雨水腐蚀所致。”

一位戴草帽的老人朝古树走来,若非老孟介绍,难辨其已年近九旬。他叫张志奇,是村里的老支书:“我从小就在这树下要,柏树长得慢得很。我看过《洛

张爱玲著有《半生缘》,纵是经典流传,但主人公情深缘浅,底色是苍凉与无奈。而中外电影于我,亦不啻魂牵梦萦的恋人,“我们”的奇缘则是如影随形、绵绵不断,这份底色,是赤诚、是希冀、是永远鲜活的生命力。

作为一个80后,少时与同龄人一样,顽皮嬉闹一个不缺。初中起,冥冥之中似有安排,人生道路渐与小伙伴们“分道扬镳”,不爱出门了,爱看历史书了,爱画名人了,爱唱老歌了,更是迷上了《巴山夜雨》《林家铺子》《乌鸦与麻雀》……迷上了王丹凤、王心刚、潘虹……

记不清是在初三还是高一,校图书室里,翻到一本《中国电影演员百人传》(1984年5月出版,1个月前,我才出生),卷首的百余位几代影星照片,从阮玲玉、胡蝶、王人美到张连文、唐国强、郭凯敏,把我彻底震撼住了,“如获至宝”都不足以形容那一刻的心情。一番斗争,感情还是战胜了理智,我这个学生干部做了整个学生时代唯一一件破坏公物的事吧,把那几百百余影星照“劫持”了,但也用情专一恒久,珍藏至今,不曾朝秦暮楚而遗弃。我把这事当作趣味段子一般,

其他就不甚了然了。后来才知道,“继光”,还有另一层“继承”和“光大”这所中学的优秀文化和革命传统的意义在。但是,直到离开继光,我依然不知道自己中学母校前身麦伦中学的历史。我想,继光中学的绝大部分毕业生,应该也像我一样,并不知道这段历史。当然,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

而今,我终于知道了麦伦中学1898年创设于上海山东路麦家圈,初名从麦都思和伦敦会中各取一字,称为“麦伦书院”。后迁移校址于虹口兆丰路(即今高阳路),建造新校舍,至今已有整整127年的漫长历史了。在我看来,麦伦也即后来的继光中学这个校园是应该好好保护的。麦伦书院原系英国基督教教会伦敦会创办,1927年收回教育权后,改名为私立麦伦中学,由

南县志》,据载此树元朝至正元年(1341年)丈八粗,清朝道光三十年(1850年)知县陈作枢测得径围二丈三尺。传说此树是仓颉当年在洛南任职时所种。”据典籍载,仓颉受鸟兽足迹启发,观察日月星云、山河湖海及飞禽走兽之特征,依形绘

来。

关于柏树,又想起一故事。友人知我喜禅宗故事,因其常给寺院送斋饭,时被称“大护法”,某日便邀我同行。寺内因柏树闻名,我们傍晚抵达,食斋饭后外出散步。居士说带我们随便走走。友人欲拍照,他们说:“黑乎乎的,咋拍啊?”友人答:“我有办法。”遂支开三脚架,用B门拍摄夜景。所谓B门,即按下快门后,相机持续曝光直至松开。其曝光时长全凭按快门之久暂。

经长时间曝光,塔的细节显现。居士们大感震撼:“你们拍到的才是真实,我们肉眼所见未必真实。”他们坚信佛法亦如是,藏于不可见的幽微处。那夜,我梦见了童年繁星。

大大方方分享给影迷微信群里五湖四海的同道们,大家哈哈一乐,并没有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判我,有位本家大姐还在旧书网上买了数本此书,特意从远方快递给我,捧在手时,满满的感激,万千的感慨。如果问我,光阴倒流一次,还会那样做吗?答案是:会!

大学时代,开始“研究”起国外老电影,此情绵绵 我的电影缘



森林中的猫头鹰(纸本设色) 庄艺岭

中国人夏晋麟出任校长。1932年,著名爱国教育家沈体兰(1899—1976)担任校长,在沈体兰主政麦伦中学的二十年间,他提出“科学、进步、民主”的办学理念并一直努力付诸实施,这在上海现代教育史上是留下深刻印记的。

查1929—1951年度《麦伦中学历任教职员名录》,麦伦中学的师资来自

全国各地,真是人才济济,甚至还有英美的教师。单从文化艺术界而言,就有赵朴初、魏金枝、冯宾符等名家,是我所较为熟知的。更使我惊喜的是,麦伦中学教师中,还有楼适夷先生和林淡秋先生两位。他们是现代左翼作家、翻译家,都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英名。我当年曾经拜访过他们,与他们通过信,得到过他们的指教,但我那时并不知道他们有过在麦伦从教的经历,否则,我一定会请他们回忆一下麦伦,谈谈麦伦时期的教学生活,那该多好。

毋庸置疑,自1903年首届学生毕业起,麦伦中学当年也培养了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不妨从我亲身经历的角度,举一个颇有代表性的例子。在我所从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樊骏。他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在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包括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构等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樊骏正是麦伦中学1949届高中毕业生。后入北大深造。我曾与他交谈过,他以自己毕业于麦伦为荣,我则以有他这样的学长而自豪。而他的大名,我后来在一次校庆时,在麦伦的毕业生名录上也查

到了。这就要说到麦伦中学的档案了。对麦伦——继光这所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上海有名的中学,其校

甚而且还有肉眼看不到的“前缘未尽”,这些年来,我和电影,非但没有渐行渐远,反而成了诸多电影人的朋友。

自从与我的“电影贵人”向梅老师结识后,跟着她参加了上影演员剧团回归武康路庆典,做梦一般与牛犇、吴贻弓、杨在葆、达式常、龚雪、吴海燕等多位艺术家合影,更是与朱曼芳老师、梁波罗老师成为忘年交。还在另一次电影活动中,为来沪的王晓棠和在沪的向梅,拍摄了一张难得一见的“影坛南北双美照”……再后来,又陆续和上海电影台前幕后的乔榛、严晓频、郭君梅、狄菲菲、夏菁、王佳彦等老师们结缘,幸甚至哉!

今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焕新开幕,首届“上海影迷节”横空出世,可谓三喜临门。作为影迷,我无疑是始终如一的,也是幸运幸福的,祝愿中国电影乘风破浪,带我远航!

影迷的故事 责编:吴南瑶

雪莉·哈扎德,出生于1931年的她自16岁开始就离开了自己的故土悉尼,过起了海外飘零的生活。新西兰、英国、法国都曾是她们的落脚地,最终雪莉选择在美国和意大利之间定期往返居住,并于1982年当选美国艺术文学学院院士。在雪莉的长篇小说《假日的黄昏》《正午海湾》《金星凌日》和《大火》中,爱情、失去和回忆是最常出现的写作主题,或许因为童年时期被裹挟于“二战”的紧张氛围,青少年时期又远赴重洋,无根的漂浮感和对战争的反思始终如影随形,奠定了雪莉的写作底色。

唐纳德·基恩则是美国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学者。年轻时被派往檀香山服兵役期间,他就开始学习日本文学。为了更好地学日语,他报名参加了美国海军,与其他士兵对日本战俘的深恶痛绝不同,唐纳德却私下与一些日本战俘建立了友谊,并因此更深刻认识到战争对人心的蒙蔽和扭曲。因为醉心于日本这座岛屿之国的一切,后来他多年旅居于日本,并申请了日本国籍。

他们两人因为一位共同的朋友离世而相识,就此开始了一段长达三十载的友情,并留下百余封书信。打开由这些书信汇编而成的《何处为家》时,我心中其实颇有怀疑:我们爱读的书信集,往往是在双方缺乏其他沟通方式的情况下诞生的——比如策兰与巴赫曼书信集、黑塞和托马斯·曼书信集,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书信集等,在这些书信集中,除了交流见闻,更多的是吐露观点、倾诉情绪,是一种表达欲在纸面的完全释放。而《何处为家》两位作者交流的年代,电话已经普及,依靠飞机进行长途旅行也不再是难事,信中经常提及他们互通的电话,以及相约的见面,那么,为什么他们依旧选择纸笔和漫长的邮路来交流?

纽约、东京、那不勒斯、伊豆、卡普里、加德满都、罗马、悉尼、诺维奇、宇佐美……这些交错、遍及多个国家城市的通信地址,是两位作家生活的真实彰显。从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是“世界公民”,并将彼此通信的习惯带到了每一个落脚点。在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被作家敏锐捕捉的地方风情人情,以及作家自身的记忆。有意思的是,在见面和电话里没法详谈的想法,通过纸笔却能清晰呈现,他们热烈地传递着自己对所到之处的感受。比如谈到宇佐美,唐纳德在“一个美丽、炎热的夏日,蔚蓝的天空中懒洋洋地飘着大朵大朵毛茸茸的积云”中想到了同样喜欢这些云彩的好友三岛由纪夫,并莫名地感觉“他

到了。史是值得回顾、梳理和研究的,而无论回顾还是研究,都需要直接或间接的文字记载作为见证,麦伦中学各个时期的档案正是直接的第一手的文字记载。麦伦中学的建立、扩展和演变,麦伦中学课程的设置、调整和沿革,麦伦中学的校训、校歌和学生组织,麦伦中学各个时期的各项校内和校外的活动……凡是关于麦伦中学的一切,在麦伦中学的档案中都有明确或详细的记载,这不正是研究麦伦的颇为珍贵的原始资料么?从这个意义讲,这部《上海市私立麦伦中学档案汇编》的编竣付梓,其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部书不仅对研究麦伦中学史有益,对研究上海的教会中学史、上海的中学教育史等等也均有益,也是上海市虹口区档案局整理并开放藏品的一个新的可喜的成果。

(本文为《上海市私立麦伦中学档案汇编》序,题目为编者所加。)

明起刊登一组《我与“蝴蝶兰”》,贵编华心怡。

张滢莹

纯粹友谊的珍贵遗存

犯的情况、美军在日本所建军事医院收治病人的情况、占领军驻地是否曾设立小型图书馆等。这些问题集中显示了雪莉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对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意愿,并部分体现在她后来的小说创作中。战争的阴影始终存在于她的作品中,家庭与国家的流离常形成作品的叙事动力。历史阴霾的笼罩下,每个人都要面对飘摇不定的人生。雪莉深入、执着地研究渐渐被人所遗忘、但在她看来永远不会过去的历史,正如她在某部小说中借角色之口说:“当人们说‘我现在不想想起那个悲剧’时,实际意味着它已永久侵入思想,并浸染一切。”

从写作生涯到日常生活,对作家作品的品读,以及与许多作家的交往(如雪莉提到和格雷厄姆·格林等人的会面,唐纳德谈及与三岛由纪夫的交际),再到各地游历,在这段延续三十年的友谊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纯粹的艺术人生——他们的对话常常跨越山海,但他们对文学艺术的钟情,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使得往复的信件中常充满了炽烈的情感。请不要将之误解为爱情,他们的友谊比爱情更为宽广无私。

“二战”的阴影始终滞留在两人的生命中,但他们对生命的尊重超越了种族、政治和国家的桎梏,也许正因为他们的反战意向如此相似,二人才在心灵上毫无隔阂。他们也是纯粹的、正直的人,雪莉曾在联合国任职多年,后来却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了其中不应存在的黑暗所在;唐纳德曾无意中涂抹过甲午战争,直到多年后了解到历史真相,毅然站出来为事实说话。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是纯粹、正直、勇气可嘉的人,他们之间的友情,以及这组留在雪莉遗产中、作为友情见证的书信,为我们留下了太多可以思考的东西。在即时通讯工具、视频通话更为普及的今天,这样的纸笔见证几近湮灭,让人在颇感遗憾的同时,更觉此类作品的珍贵。

假如我是一棵竹,春日里萌芽,泥土中破发。阳光下舒叶,大雨后拔节。

假如我是一棵竹,叶茂时自持,秋抚中坚守。星月下逐光,风雪后挺拔。

假如我是一棵竹,不美松柏青,不慕长安花。笑待青山雨,更知地上霜。

夜光杯